

# 新中国60年普鲁斯特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涂卫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曾觉之1933年发表了纪念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长文《普鲁斯特评传》,由此起始的中国普鲁斯特小说研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政策引导、苏联学者对普鲁斯特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和“颓废派”的定性,陷入30年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普鲁斯特研究重又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作家寻求写作新思路的实践相呼应,《追忆似水年华》主要作为西方现代派之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引入我国。1989—1991年,15位译者合作将小说译成中文,此后对普氏小说的研究渐渐由少数通法语的学者扩大至众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和作家。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兴起的国学热,使我国的一些普鲁斯特小说研究者开始从沟通中法文学世界的角度研究《追忆》。21世纪以来的中国普鲁斯特研究,侧重于对小说的时间艺术和诗性回忆的研究。近30年来,在几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逐渐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空白,与国际这类研究渐至同步,并显示出自己的研究特色。

**关键词:** 普鲁斯特; 小说研究; 考察分析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2)03-0091-10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初版诞生历经漫长而曲折的过程(1913—1927),且七卷作品的后三卷在小说家去世后出版,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小说又经历两次重新修订出版。与此相应,对小说的研究也显出起伏变化的趋势,经历了几个阶段。与19世纪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小说不同,普鲁斯特的小说被视为20世纪小说形式革新的开山之作。在小说诞生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小说的研究呈现出缓慢而稳步上升的趋势,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J.-Y.塔迪埃在他主持修订的伽里玛出版社新版七星文库本《追忆》总序中,对普氏做出至高评价:“长期以来人们都说,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意大利有但丁,法国没有任何作家可与他们媲美。已出版

的关于普鲁斯特的著作的数目令人想到,法国现在和将来有马塞尔·普鲁斯特。”<sup>①</sup>普鲁斯特成为法国文学的象征。下文中,我们将立足于中国的普鲁斯特小说研究,在与法国普鲁斯特研究的关系中,展现《追忆》研究的四个阶段。

## 一、1949年前的普鲁斯特研究:初兴

1949年之前,出现了中国普鲁斯特研究的初兴,这大致对应于法国普鲁斯特研究第一阶段(始于一战结束后作品陆续出版至作者去世后的20多年间)。此间法国批评家主要将《追忆》作为心理小说阅读,并与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相联系研究。一些普鲁斯特研究家还将《追忆》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进行比较。两位德语批评家库尔提乌斯和斯皮策对《追忆》的文笔进

收稿日期:2012-03-02

作者简介:涂卫群,女,湖北黄陂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

①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1987), pp. X - XI.

行了研究。<sup>①</sup>从 30 年代起,与两次大战间社会政治状况有关,学者们对《追忆》的兴趣渐冷,这种状况持续到 40 年代末。在中国,该阶段的代表作,乃曾觉之的纪念普氏去世十周年的长文《普鲁斯特评传》<sup>②</sup>。作者参考手中原资料<sup>③</sup>对普氏进行了较深入的评介:从其生平到构思作品的方法和风格,并探讨了小说中的社交与爱情世界。他指出小说家所进行的心理描写,与同时代的柏格森的哲学和心理分析学的研究不谋而合,称其为“法国式的分析心理的小说家”。他还探讨了普氏对滑稽手法的运用,视其为“喜剧作家”。作者特别强调了普氏的作品与其生活的密切关系。若将评传与作者列出的参考书之一 L. 皮埃尔·坎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其生平与写作》(1928)<sup>④</sup>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曾觉之并未提出多少独特的个人观点。不过他的评介却是在基本了解普氏的作品、深入阅读和思考过当时法国普鲁斯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因此即使今日读来,仍令人感到准确精当,不失为中国普鲁斯特研究兴起阶段之佳作。不过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对他的工作似乎并不知晓,在他们对普氏的评介中,并未提及曾觉之的名字,而且对小说家的姓氏和作品标题均给出不同译法。徐仲年在其《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1946)、吴达元在他编著的《法国文学史》(1946)中,都对普氏进行了十分简单的介绍。三四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始受时政(民族存亡、抗战、不同的意识形态等)影响。一些研究者显出某种政治倾向,他们将 19 世纪以来的文艺划分为“为艺术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新社会的艺术”三类,并将它们归结为颓废派、现实主义和苏联的文艺,进而肯定后两者而对前者持怀

疑与批判态度。<sup>⑤</sup>这种划分与取舍预示了 1949 年以后的长时间里外国文学研究的大致走向。

总之,这一阶段除了曾觉之对普氏的生活和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介,其他学者对普氏和其作品的了解很可能来自间接渠道,如通过阅读法国人、日本人、苏联人写的文学史。往往介绍得十分简单,评价也不很高。直到新世纪,许钧、段怀清等重提早年中国普鲁斯特研究<sup>⑥</sup>,曾觉之的名字和他的《普鲁斯特评传》才真正引起注意。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普氏作品的研究十分冷清,与小说本身冗长、内容复杂且难以简单归类、作品未经翻译<sup>⑦</sup>、对小说的评介研究限于极少数学者有关。

## 二、1949—1979 年间的普鲁斯特研究: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间,普氏的名字和其作品从研究者和读者视野里消失。这与当时的文艺政策有关。外国文学研究受到明确的政治引导,1958 年翻译出版的、苏联人普什科夫编著的《法国文学简史》便是一例。普氏和其作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作家的颓废和反动倾向”的小标题下,著者对小说进行了简短介绍,最终《追忆》被定性为“反现实主义、反社会的小说,不仅是法国的、而且也是整个欧洲的颓废倾向的特殊的总结”。<sup>⑧</sup>很可能正是当时的文艺政策再加上这一反现实主义、颓废派的定性使中国普鲁斯特研究陷入沉寂。

相应地,早在三四十年代便对普氏进行评介的学者保持沉默。建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曾觉之和吴达元并没有机会讲授法国现代派文学,当

① 他们的研究得到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普鲁斯特研究家的高度评价。

② 《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 年第 288、289 期。

③ 曾觉之在文后列出了参考书目。

④ 该书初版发表于 1925 年,随后于 1928 年、1936 年两度增补修订,从曾觉之对普氏滑稽手法的评述,可以判断他参考的是 1928 年版。

⑤ 参见徐伟“第十讲 文艺思潮的转向”,《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上海:世界书局 1943 年。

⑥ 许钧《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粤海风》2007 年第 2 期。段怀清《曾觉之与普鲁斯特》,《新文学史料》2007 年第 2 期。

⑦ 在这段时间里,似乎只有卞之琳翻译了《追忆》的开头部分,题为《睡眠与记忆》,《大公报·文学副刊》1934 年。

⑧ 普什科夫《法国文学简史》,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3—154 页。

然也不可能发表普鲁斯特研究论文。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在1979年出版的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合著的《欧洲文学史》(下)中,最后一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文学”的法国部分,论及“巴黎公社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罗曼·罗兰”,普氏自然被排除在外,显然改革开放前的文艺政策依然在发生影响。

而这一时期法国普鲁斯特研究新浪迭起。40年代末,莫洛亚撰写《追寻马塞尔·普鲁斯特》(1949)之际,得到小说家遗产继承人许可,翻阅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草稿。不久后,德·法卢瓦在同一批资料中“发掘出”《让·桑德伊》(1952)和《驳圣伯夫》(1954)。1962年,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普鲁斯特遗产”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陈列部收藏,1977年、1985年图书馆又获两小批手稿。普鲁斯特研究史上,手稿的逐步发现和公开出版(仍在进行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事件。1954年伽里玛出版社以七星文库本的形式重出《追忆》,便参考了普氏遗产继承人提供的手稿资料。这一系列与手稿的发现相联系的出版工作,引发新的研究兴趣,并对20世纪下半叶《追忆》研究影响深远。他们先后启迪法国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批评”和70年代末逐渐产生影响的溯源批评(生成批评),这一时期可视为法国普鲁斯特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从批评方法看,《驳圣伯夫》的出版适逢其时。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家对一些19世纪重要作家的阅读和与此相关的对19世纪著名批评家圣伯夫的批判,普氏认为圣伯夫混淆创作者与生活中的人,致使他无法理解同时代的大作家;由此,普氏的阅读与批评观得以呈现,要之在于作品乃另一自我的产物,从而将研究聚焦于作品。这与巴尔特、热奈特等倡导的法国“新批评”的实践相得益彰。他们采用符号学、文本批评和叙事

学等方法阐释《追忆》,引发大量从符号分析、叙述者、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角度进行的《追忆》研究。70年代初兴起、成熟于70年代末的溯源批评,由“新批评”热衷的文本批评转向写作研究。普氏遗留的大量手稿为这一研究提供丰富资源。<sup>①</sup>与此同时,众多批评家还从主题批评、精神分析学、文笔(风格)研究、比较研究等角度对《追忆》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30年间法国普鲁斯特研究家对《追忆》的新发现,从80年代开始被我国学者接纳,同时接纳的还有第一阶段和当代的法国普鲁斯特研究,心理学批评、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文笔研究等方法都被运用在对普氏作品的研究中。对我国学者而言,唯一比较陌生的是溯源批评,由于吟咏之间参照普氏手稿,难以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此外,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也未见我国《追忆》研究者采用。

### 三、1980—1999年间的普鲁斯特研究:复苏与蓬勃发展

80年代中期《追忆》各卷初版版权纷纷到期,法国GF-弗拉马里翁(1984—1987)和伽里玛(1987—1989)两大出版社分别参照新获手稿资源重出小说,在世界范围内普鲁斯特研究迎来又一高潮。学者们除了继续采用叙事学、溯源批评、文笔研究等方法探讨《追忆》,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新思路,如对小说进行社会学分析,探讨小说作为跨世纪的文学作品与19、20世纪文学艺术的关系,以及《追忆》与后现代写作的关系等等。

这一时期,普鲁斯特研究在中国的复苏显示为重新起步。在该阶段的很长时间内,除卞之琳在1988年曾提及他在30年代对普氏作品的翻译,其他学者对1949年前的那一段译介研究史似

① 70年代初成立的属于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所(ITEM)的“普鲁斯特研究组”(L'équipe Proust)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国家图书馆的“普鲁斯特遗产”中的草稿和手稿等进行清点、编目、誊写、出版及批评性开发。研究组有自己的资料中心,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研讨会,并有自己的出版物《普鲁斯特通讯简报》(年刊)。他们的研究与出版工作,成为普鲁斯特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

乎并不知晓,基本上也无人问津。罗大冈在他为译林版《追忆》所写的序言(1989)中指出“在中国,研究介绍法国文学的专家们很少提到普鲁斯特和他的《似水年华》。”<sup>①</sup>

确切说,中国学者对普氏和其作品的重新发现,始于80年代初。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呼应,这一阶段对在“文革”期间被打入冷宫的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译介研究显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种兴趣与中国作家试图走出“文革”阴影、寻求写作新手法一拍即合。没有某些杰出作家的实践和其热心读者的关注,对这些西方作品的译介研究无疑难以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阶段,普氏主要是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意识流写作大师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的名字常与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的名字一同出现。而在当时中国文学界已产生重大影响的王蒙的创作,一度被认为受到西方意识流手法的启发。<sup>②</sup>从这一意义上说,学者们从意识流角度引进普鲁斯特等人的创作,不失为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选择。

在学术界,就普氏而言,先是出现了一些翻译选段和与之相伴的介绍性文章。作为开拓者的,大概是管震湖译《司旺的爱情》(1981)<sup>③</sup>,译文前有“编者”评介,对普氏的生平、写作特点、主题与人物、历史地位等进行了简要介绍。接下去是徐和瑾的《马塞尔·普鲁斯特》(1982),作者首先介绍了普氏的生平与写作历程——从早期写作直至《追忆》的诞生与出版,随后从《追忆》与传统小说的关系,作品的体裁、题材特点,具体内容和主题,写作手法与哲学基础,句子的特点、人物的塑造和

描写事物的独特手法等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作品。上述两文分别提到《追忆》对意识与潜意识,及对无意识的回忆的发掘,且徐和瑾也采用了“意识流”一词,不过,专门将普氏作为意识流大师介绍给读者的,也许是冯汉津的《法国意识流小说作家普鲁斯特及其〈追忆往昔〉》(1982),作者特别强调了小说家在描写幻觉上的艺术功力,一切都经过意识的过滤。刘自强的《普鲁斯特的寻觅》(1987)与王泰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普鲁斯特》(1988)似可互相补充,两篇作品都试图展现《追忆》独特的艺术性;前者探讨了普氏寻觅的对象——某种“精华”和其确切含义,后者试图展现普氏小说作为大教堂式的建筑的结构特征。比较系统全面地从意识流和心理小说的角度介绍和研究普氏作品的,是长期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柳鸣九。从1985年始,他在一系列文章和序言中介绍意识流方法和普鲁斯特的作品。<sup>④</sup>在他的《法国心理小说的发展历程》(1988)一文中,对包括《追忆》在内的“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介绍里,尤其提到柏格森对实际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区分。这种区分,一直是后来的中国普鲁斯特研究的重要话题。徐知免<sup>⑤</sup>的《论〈追忆逝水年华〉》(1989)以典雅细腻的文字准确通透地展现了普氏的小说世界(爱情、浮华世界、内心经验)和某些艺术手法(感觉与联想、内心电影、由一条主线贯穿的复合结构等)。80年代末,还引进了两本普鲁斯特传记。<sup>⑥</sup>

这一阶段对中国普鲁斯特研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事件,乃译林出版社组织十五位译者翻译

① 罗大冈《试论〈追忆似水年华〉(代序)》,《追忆似水年华I·在斯万家那边》,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

② 1982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刊载三篇文章展开对王蒙作品的讨论,其中徐怀中和冯骥才的文章都在与意识流的关系中谈论王蒙的创作。

③ 《外国文艺》第5期。译者选译了小说第一卷第二部《斯旺的爱情》中的一些片段。

④ 柳鸣九主编了属于《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系列的《意识流》卷(1989)和属于《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系列的《意识流经典小说选》(1995),从理论和作品两方面探讨和译介意识流,《追忆》成为两书关注的焦点之一。

⑤ 1988年《世界文学》第2期刊载了徐知免译小说第一卷第一部《贡布雷》第一章(结束于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段落)。

⑥ 蒋一民译皮埃尔·坎的《普鲁斯特传》(第一部分,1988年;2011年出版全译),许崇山、钟燕萍译克洛德·莫里亚克的《普鲁斯特》(1989)。

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sup>①</sup>译本卷首施康强译《安德烈·莫洛亚序》和罗大冈的《试论〈追忆似水年华〉(代序)》两文,对我国后来的《追忆》研究起了重要引导作用。莫洛亚序显示了始于50年代的普鲁斯特研究兴趣:当时借助一系列手稿的出版,学者们开始了解普氏创作《追忆》前的准备性写作,并开始关注作者的写作观念。诸如莫洛亚文中涉及的两重互相呼应的基本主题,摧毁一切的时间和复活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记忆),以及更为本质性的艺术与永恒的关系的主题<sup>②</sup>;作品的结构:如文中探讨的大教堂式的构造、两翼支撑起最终将会合的拱顶;及文笔特色:如隐喻与形象的运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成为普鲁斯特研究热门话题;尽管如前所述,7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问题有所改变。罗大冈的代序,主要从两方面介绍普氏的作品,一方面强调《追忆》乃生活的镜子,以暗中表明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并将其归入“为人生的艺术”之列;另一方面指出了《追忆》作为现代派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开启20世纪文学并与19世纪文学明显区别的种种特征。作者将《追忆》归结为“回忆录式的自传体小说”,对后来的中国普鲁斯特研究颇有影响。与这一翻译工程直接相系,是参与翻译的学者们对《追忆》的介绍、研究和相关研究资料的翻译。<sup>③</sup>正是在他们作为翻译实践者兼研究先行者的双重努力下,中国的众多作家、文学爱好者得以逐步进入《追忆》的世界,也使从今往后对《追忆》的研究不再限于

少数懂法语的学者,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外国文学学者和作家群体。

新时期伊始的普鲁斯特研究论文,大都遵循从生活到作品的套路,且从流派、主义角度展开的评介较多。这种角度侧重对作品进行总体把握、为作品定性归类,往往缺乏对作品的独创性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且独特个人观点的表达明显不足。80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些较注重展开作品本身的问题和较具个性的研究。张寅德的《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机制》(1989),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对《追忆》的时间形式进行了严谨的分析。郑克鲁的《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和《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1992),紧紧结合作品从两方面对普氏的写作风格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探讨。丁子春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建构轨迹》(1993)提出普氏艺术经验的精髓,乃“确立了以主观真实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并从小说的哥白尼式的结构框架、新旧交替的追忆笔法、通感型的联想模式等方面展开这一体系。论文构思缜密、论述优雅细腻。张新木先后发表《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1997)、《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程式》(1998)等论文,着重分析《追忆》的两重形式:小说中荟萃的各类时光符号及由此构成的时光体系,作为小说叙述程式的人称“我”。在普鲁斯特研究专著中,张寅德的《意识流小说的前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1992),可以看成这一阶段中国普鲁斯特研究在与国际普鲁斯特研

① 1989—1991年陆续出版,根据伽里玛出版社1954年七星文库本译出。仅从译本的择定看,我们落后了很长一段时间。英美世界第一个《追忆》译本完成于1930年代,80年代初根据1954年七星文库本进行了修订,90年代初又出版了参照1987—1989年七星文库本修订80年代译本的新译。

② 莫洛亚指出,“任何东西只有在其永恒面貌,即艺术面貌下才能被真正领略、保存:这就是《追忆似水年华》的根本、深刻和创新的主题所在。”这一观点深入人心,得到中国普鲁斯特研究者的一再发展。

③ 在此仅给出他们的名字和一些相关作品的篇目:第一卷李恒基、徐继曾;第二卷桂裕芳(1992年与王森合译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袁树仁(1987年译莫洛亚的文论集《从普鲁斯特到萨特》);第三卷潘丽珍、许渊冲;第四卷许钧(发表多篇与翻译普鲁斯特相关的评论文章,如1991年《〈追忆似水年华〉卷四翻译札记》、1993年《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杨松河;第五卷周克希、张小鲁(1993年译《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寅德(撰写多篇普鲁斯特研究论文,如1989年《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机制》、1990年《现实·心理·艺术——论〈追忆似水年华〉的三重内涵》、1992年出版专著《意识流小说的前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第六卷刘方、陆惠慧;第七卷徐和瑾(1985年译普鲁斯特研究重要论文,热奈特的《普鲁斯特和间接语言》的中间部分,约占全文近1/4篇幅;1998年译出莫洛亚的《追寻马塞尔·普鲁斯特》,译为《普鲁斯特传》)、周国强。

究接轨的努力方面最高水平的成果。70 年代以来普鲁斯特研究的重要方法基本上都有所涉猎,如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以及从哲学、美学、社会学等角度展开的探讨。专著在展现普氏作品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工具。涂卫群的《普鲁斯特评传》(1999),对普氏成为小说家的历程——童年的阅读、青年时代的社交生活、翻译拉斯金、通过仿作超越偶像崇拜、正式写作《追忆》前的多重写作尝试、普氏与 19 世纪一些大作家的关系等进行了较深透的展现。90 年代还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的研究性质的译作。<sup>①</sup>

#### 四、21 世纪的普鲁斯特研究: 走向成熟

在法国,自 20 世纪末到现在,从叙事学角度对《追忆》进行研究的兴趣渐冷,溯源研究、主题研究、文笔研究、互文性研究、比较研究等仍维持着普鲁斯特研究的热度。普鲁斯特研究家们继续对《追忆》进行多方面阐释,研究的兴趣从近年来举办的一些学术研讨会的题目便可看出。孔帕农在法兰西学院主持以“普鲁斯特,记忆(回忆)与文学”<sup>②</sup>(2006—2007),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所相继组织以“比较普鲁斯特”(2007—2008)、“普鲁斯特与诗”(2008—2010)、“《追忆似水年华》,关于战争的小说”(2010—2011),P. - E. 罗贝尔在巴黎三大主持以“马塞尔·普鲁斯特与 19 世纪:传统与嬗变”(2010)等为主题的研讨会。

进入新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普氏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作家。在中国,曾与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意识流或内心独白式写作,不再具有先锋派写作的意义;相应地,对其作品的研究,也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与作家的创作和广大的读者群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总体上看比前一阶段略显冷清。2010 年译林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推出前两卷的新译本<sup>③</sup>,尽管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对两位独自重译普氏小说的译者周克希<sup>④</sup>和徐和瑾<sup>⑤</sup>的访谈和相关文章,似并未引起当年译林初版问世时的热切关注。这并不排除普氏的作品已渐渐赢得我国一批文学爱好者和作家的持久兴趣,对于后者而言,这位法国作家成为他们创作与思考的一位日常对话者;作家赵丽宏、王安忆都曾充分肯定周克希的新译本。王安忆是这样推荐周克希的译本(节本)的“假如你一个人旅行,就请带着这本小书。它絮叨着他的心事,你却听见你的自语。就这样,自己伴着自己离家远行。”在此,普氏和其作品已成为孤独的旅人(谁又不是?)最亲近的朋友,乃至读者自鉴的镜子。

这一时期,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增加,且略呈递增趋势。一些现象表明中国普鲁斯特研究正在走向成熟,这首先显示为出现了两类研究者,一类是懂法文的普鲁斯特研究学者,他们在深入研读原文《追忆》和国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从参考资料的获得、关注的问题等方面看,他们的研究渐与国际普鲁斯特研究达到同步。另一类是无法通过阅读法语

① 王文融译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1990)、桂裕芳和王森合译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1992)、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组织翻译的文集《普鲁斯特论》(1999)。在最后这本文集中,收入了对法国乃至世界普鲁斯特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贝克特的论文《普鲁斯特论》(1931)。由于贝克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9)的声誉,在中国,这篇论文不仅对普鲁斯特研究者,而且对一般的文学爱好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直到新世纪,这三部作品仍是许多研究者的的重要参考读物。

② 2009 年以文集形式出版。书名 *Proust, la mémoire et la littérature* 中的 *la mémoire* 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回忆(回想往事的行和结果)与记忆(回想往事的能力,回想功能的运作方式)。该文集所涉及的主要是记忆而非回忆的问题,诸如小说中的文学记忆问题——普氏如何将其所读过的作品纳入自己的小说,写作与记忆的关系等;而非将他的作品作为一部回忆录对待,以揭示他如何复活自己过去的的生活。

③ 2004 年、2005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曾分别推出小说第一卷的新译本。

④ 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87—1989 年七星文库本译出,并将小说总标题译为《追寻逝去的时光》。

⑤ 根据 GF-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84—1987 年版译出,但保持译林初版总标题《追忆似水年华》。

原文进行研究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他们借助中文版《追忆》、翻译过来的普鲁斯特研究著作或者还有英文普鲁斯特研究资料,以及大量相关译著,凭借对中外文学作品的丰富研读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高水平的个人学养,从文学的本质、其本身的发展与其普遍规律等方面展开对普氏小说的研究。他们之中更有少数学者并不满足于在研究上与国际普鲁斯特研究接轨,而进一步寻找基于中国文学传统和个人文学素养的独特的研究道路,以实现在更深的层次上沟通普氏的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并揭示文学通过提供审美享受和对人生的深入认识,实现人与人之间深层交流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研究中,会通之境都是至高的审美境界,会给人带来难以言喻的精神愉悦。一些前一阶段较活跃的普氏译介研究者,在不断积累学识和磨砺思维的基础上继续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普鲁斯特研究者,和一些新的研究兴趣与角度。下文将结合具体的论文、论著一一说明。与前一时期相比,从流派、主义的角度(往往比较外在)进行探讨的论文明显减少。一些较重要或较有影响的普鲁斯特研究论文、论著也经由翻译引入我国。<sup>①</sup>

就普鲁斯特研究论文而言,新版《欧洲文学史》第三卷(上册)《二十世纪二次大战前欧洲文学》(2002)法国文学部分终于加入了由王文融执笔的对普氏作品的介绍和评价。许钧在其《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与宋学智合著,2007)一书中,特辟一章《普鲁斯特与追寻生命之春》追溯普氏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史,从翻译、研究、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郑克鲁进行着不懈的普氏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多声部叙事艺术》(2004)探讨了《追忆》第一人称叙述的独特技巧;《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2006)对比了两位大作家在构思与塑造人物方面的异同。《普鲁斯特的小说理论》(2009)则试

图对普氏的小说理论进行一番总结,先后探讨了小说家的哲学思想渊源和其文学观念;将其归入意识流小说家行列,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作家加以区分;随后又将普氏与其所欣赏的作家进行比较,以揭示其所受影响。涂卫群也在继续从事《追忆》研究。其《百年普鲁斯特研究》(2005)对《追忆》出版以来的批评历程(以法国为主)进行了综述,随后其研究主要致力于沟通中法两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中国艺术“插曲”对普鲁斯特美学的揭示作用》(2006),探讨了中国艺术在普氏小说中扮演的角色;《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可见”与“不可见”的主题》(2011),从小说中音乐与教堂所扮演的角色展开作品的艺术与精神境界;《小说之镜:曹雪芹的风月宝鉴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视觉工具》(2011),从小说中的世界、小说家提示的阅读方法等方面探讨他们的小说作为宝鉴与视觉工具所起的令人换新眼目的作用。

另有一些学者在对自己所熟悉的与普氏有关的其他作家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其作品。刘波的《普鲁斯特论波德莱尔》(2002),借助普氏论波德莱尔的两篇文章,辨析诗人与小说家在审美趣味上的共鸣,并探讨了普氏独特的批评方法。刘晖的《普鲁斯特与圣伯夫——〈驳圣伯夫〉之真谛》(2011),在深入阐释圣伯夫的批评方法的基础上,着重揭示普氏对这位19世纪著名批评家的误读。这一角度颇具新意,即使从国际普鲁斯特研究的语境看。圣伯夫的最有代表性的“传记批评”方法,在普鲁斯特的有力反驳之下,渐渐被遮蔽、遭遗忘;法国普鲁斯特研究家中即使间或有为圣伯夫的某些观点、个别手法辩护者,也很少如此认真地展开圣伯夫的批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圣伯夫的“传记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文如其人”的观念有些不谋而合之处,确实有在与普氏的对话中重新审视的必要。杨彦玲的《谈白先勇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兼与普鲁斯特比较》

<sup>①</sup> 余斌译德波顿的《拥抱似水年华》(2004)、姜宇辉译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2005)、李幼蒸译巴尔特的《普鲁斯特和名字》(2008)、涂卫群译斯皮策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风格》(2009)。

(2006)、陈莹珍的《内反省现代性叙事例析》(2008)、田广的《论废名与普鲁斯特小说之“断片的美学”》(2009),分别将《追忆》与白先勇、陀思妥耶夫斯基、废名作品的某些方面进行比较。

钟丽茜的两篇论文《心理时间与审美回忆——谈〈追忆似水年华〉中艺术与时间的关系》(2007)和《通感:感受世界的隐喻性知觉方式——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革新》(2008),主要从审美的角度、挖掘《追忆》的诗性因素。这一角度不但新颖独特,而且便于沟通普氏小说与中国文学诗性传统。黄晞耘的两篇论文《普鲁斯特式写作或浮出海面的冰山》(2007)、《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2010),分别从普氏的写作特点(描写与分析结合)和《追忆》中的战争主题分析普氏的作品,是近期普鲁斯特研究中较出色的论文。后一篇关于战争主题的论文,将普氏和其作品与大战的关系梳理得较清晰全面;而且这篇论文的发表,先于法国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所组织的相同主题的研讨会,显示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他们两人的研究,从会通文学境界和发现新的研究主题两方面显示出我国的普鲁斯特研究者的杰出成就。

多位学者从小说家的新的时间观和与之相应的叙事技巧等方面探讨了普氏小说的独特性。如高奋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间长河里的航标》(2001)、陈茜芸的《普鲁斯特:新时间观引发的小说革命——兼谈科学、哲学与文学的关系》(2001)、刘成富的《普鲁斯特创作风格的再认识》(2001)、张介明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时间研究》(2005)、谢雪梅的《在知觉信念中重构的世界——〈追忆似水年华〉的时间艺术研究》(2006)等。其中张介明的《追忆》叙事时间研究,从时间叠加、时间主题的特点(艺术与时间主题合二为一)、时间具象、空间化时间等方面,较深刻地展开了《追忆》的时间艺术。

就普鲁斯特研究专著而言,涂卫群在新世纪之初出版论著《从普鲁斯特出发》(2001),继续从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在与众多相关文学家和普鲁斯特研究家的对话中,深入探寻《追忆》乃

至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文学写作所面临的重重问题和其可能的解决,以及《追忆》与20世纪文学批评的关系。钟丽茜的论著《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2010)尤其值得关注。作者将普氏的小说置于西方美学史上诗性(或审美)回忆的传统中,探讨这种特殊的回忆形式的来龙去脉、其特点和普氏对其贡献,及审美回忆对于普氏、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生的价值。论著将普氏的审美回忆置于由“失乐园”到“复乐园”的框架中,充分展现了普氏小说的艺术精神和其对现代生活的拯救性力量。这是一部难得的综合与会通之作:一方面,在作者笔下,在回忆往事、审美回忆、存在的意义之间,并没有中断,经过一系列细微过渡形成完整的寻找和寻回的过程;另一方面,作者谙熟中国文学的诗性传统,从而在论著中潇洒自如地沟通两个世界的艺术精神。

从上述一些研究中,可明显感到研究者与作品展开多层次深切交流,作品不再仅仅是认知对象,而与研究者丰富的生活体验及阅读经验有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阶段,《追忆》的心理时间和其时间艺术成为中国普鲁斯特研究最热门的话题,而无论是心理时间还是时间艺术,都是在与回忆、记忆的关系中展开讨论。这种反复出现的兴趣,一方面可看成对莫洛亚序中时间与回忆两重基本主题的深入展开;另一方面,正像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追忆似水年华》这一标题的喜爱,它体现出某种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对追忆与伤逝主题的倾心。从这一角度研究普氏的小说,可以看成一种基于中国文学诗性传统,唤起文学记忆、沟通文学世界的独特方式。这与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一段时间后(也即90年代末),重兴的国学热不无关系。在法国文学中,这双重主题,主要由19世纪浪漫派文学发展而来,并非古已有之。就追忆与伤逝主题而言,一些中国学者尤其强调普氏小说中的乐观精神和对艺术的信心。值得追问的是,普氏的信心从何而来?在此,有必要指出,也许正是《追忆似水年华》这一标题,在很深的程度上引导了我国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和研究。在法文标题



里,与“追忆”相应的表示行为的词乃“寻找”(Recherche),而且在“玛德莱娜点心”的片段中,普氏进一步拓展“追寻失去的时光”的方式“寻找”(Chercher)么?更甚于此:创造。”因此寻回过去的时光,不只基于回忆,更重要的是想象和创造。

仅从这一时期普氏小说与回忆、记忆的关系看,法国学者更多从记忆角度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探寻小说家与过去(远远超出作家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主要是与过去的传统及作品的关系,以及根据他本人写下的大量手稿(相当于记忆库)对作品进行的不断修改:作品远非一气呵成的回忆之作,而是在带有各种明确意图层层加工之下、尤其是在与传统和众多文学作品的对话中诞生。中国学者则侧重探讨回忆与写作的关系,这意味着,写作是对个人的过去的追寻,这一意义上的写作是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方式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既拉近了普氏与中国文学诗性传统的距离,同时又难免遮蔽了小说家本人在作品中表达的另一番重要意图和思想:写作乃追寻真理和创造世界,小说家笔下的欢乐正是观照真理和创造世界带来的欢乐;这才是普氏小说中的乐观精神的主要源泉,通常的回忆往昔难以产生这种效果。这一点值得注意。

从负面因素看,这一时期的少量论文仍未脱介绍性质,从作者生平到作品内容,或叙述和复述性文字较多,未能对作品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展开和分析,研究性不强。偶见抄袭现象。与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相比,一些论文略显粗糙,文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表明论文作者并未细读作品。尽管获得参考资料的渠道更多,一些作者并不了解其他研究者已发表的相同或相关主题的论文、论著,且参考资料显得十分陈旧。

## 五、结 论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正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分别代表了法中两国小说艺术之最高成就,同时深深植根于两国文化,他国读者对其接受,远比不上更通俗的二三流小说来得容易,当然

也对研究者的文学与文化积累提出更高要求。基于作品本身的难度,《追忆》在中国的研究始终显出较冷清的面貌。在整个中国普鲁斯特研究发展中,不难看出时政、国内文学家的兴趣、特定时代的流行话语和整体文化水平,都影响着学者们的研究。另一方面,翻译也对研究发生着积极影响,不只涉及普氏小说的翻译,还涉及国外普氏研究专著和论文,及其他相关著作的翻译。

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的普鲁斯特研究者参考的往往主要是国外的研究资料或翻译过来的普鲁斯特研究或外国文学论文、论著,显然多数国内研究者更信赖国外的研究,而并不十分关注国内的研究成果。这种现象透露出国内学者之间缺乏交流与论辩,而这不利于中国普鲁斯特研究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辛勤耕耘,无论是在与国际普鲁斯特研究接轨方面,还是在从审美角度沟通不同的文学世界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我们在30来年(1980—2011)的时间里填补了曾经耽搁的30年(1949—1979)的空白,并渐渐达到了与国际普鲁斯特研究同步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学者们的文化与文学修养更趋平衡全面,从而我们的研究渐渐具备了立足本国文化与文学,融会贯通他国文学与文化的特色。在此基础上,《追忆》作为一部世界文学杰作,综合了“为社会、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诸侧面的特点,不断得到认识与揭示。

不同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多少有必要唯新是从;文学研究,有着与文学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特异性,特别是作为人心、人性的表达,因此与作品进行深入交流始终应是第一位的。至于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固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作品的某些方面,却需要经过研究者细致入微的消化吸收过程,方能避免生搬硬套、终至隔膜,无助于理解作品。就中国普鲁斯特研究而言,张寅德的《意识流小说的前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在对西方理论进行融会贯通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尤其值得借鉴。再者,外国文学研究的魅力

之一,还在于向本国读者展现一个陌生而亲切的文学世界,陌生可能在于作品的形式、所表达的某些思想和所植根的传统等,亲切的方面则来自研究者成功地会通作品和我国文学传统中类似的艺术与精神境界。就此而言,钟丽茜的《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非常值得参考。

综上所述,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学者,一方面有必要深入了解国际上已有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努力加入主流普鲁斯特研究、展开国际学术

交流;另一方面,国内同行之间的交流同样有必要加强。基于对《追忆》本身的不断深入的阅读、对普鲁斯特所植根的法国文学和文化的更充分的认识,以及伴随新译本的出版读者群的扩大,加上学者们不断深化的多方面的文化积累,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会有可观的发展。

(感谢申丹、赵桂莲、章燕诸位教授,她们细致的审读和所提出的珍贵修改建议,使本文得到有效地改进。)

##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Proust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u Weiq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important article on Proust in China was written by Zeng Juezhi in 1932. Sporadic research ensued but halted after 1949, for Proust's works were labeled "anti-realist" and "decadent" by some Soviet critics who were deemed the authority on such matters.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academic freedom after China reopened its door to the world in the late 1970s, Proustian research quickly revived and grew at a great pace, owing to a widespread interest in Western modernist works initiated by some Chinese writers who were eager to experiment with newly-found way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saw a surge in the translation of and research on Proust. Interestingly, during this period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was mainly introduced as a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reflecting the popularity of the technique much favored by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in China. While Proust studies in China today are displaying unprecedented maturity, rigor, diversity and originality, scholars have given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ovelist's masterful treatment of time experience and his poetical rendering of memory, due to their reading of Proust as remarkably echoing, in a refreshing way, to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Key words:** Proust, fiction study, review and analysis

(责任编辑 何方)